

近代日本在华所用日语教科书研究 ——以文部省统编教材《口语》为例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陈林俊

常州大学 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

许长明

[摘要] 近代日本在华推行语言同化政策过程中,曾编撰、使用过数量不少的日语教科书。本文以文部省统编教材《口语》为研究对象,结合与同期其它相关教材的对比,分析了其在编排形式与形象构建等方面的主要特征。在编排形式方面,该教材大量使用彩色插画,采用表音式假名书写,对应直接式教学法,教师用书细致详实。在形象构建方面,该教材通过场景、人物与内容等的安排,力图实现对日本的美化、对战争的淡化以及对中国的矮化与同化。研究发现,作为日本在华所用日语教科书,该教材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同期各教材在假名书写方式等方面的不一致,也反映出近代日本语言同化政策的先天不足。最后,不可否认的是,近代日语教科书的编订为日本战后对外推广日语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 日语教科书 形象构建 同化

引言

语言同化教育是近代日本对华侵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大量日语教科书被编订出来。仅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战前、战中、占领期日语教育资料”(亦称“长昭直兄文库”)就有286种之多。而根据吉冈英幸的调查(2004),在1945年前,日本国内外(包括日本国内与日据殖民地)出版的日语教科书多达1101种。以上教材除了一部分面向朝鲜半岛、南洋等地区之外,大部分都以中国人为对象。作为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见证者,这些资料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目前我国学界对近代日语教科书的研究已不鲜见,总体而言,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对我国自行编著的日语教科书关注较多,如李小兰(2003、2006)、鲜明(2011)、马可英(2012)等;第二,宏观维度的研究较多,如徐雄彬、王升远

(2015)关于日本对东北地区朝鲜族奴化教育的考察,谭建川(2015)对教科书中“台湾故事”的解读。然而,基于文本的微观考察与个案研究还较为鲜见。本文采用“解剖麻雀”式研究手法,选取文部省统编教科书《口语》(原书名为『ハナシコトバ』,本文所用版本来自于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图书馆“长昭直兄文库”)为例,结合与同期相关教科书的对比,考察其基本特征,探讨近代日本在华语言同化教育中教科书的构建路径,由此管窥近代日本在华的语言政策。

1 统编教材《口语》的产生

近代日本面向中国人的大规模日语教育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结束后的台湾地区,时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长的伊泽修二是始作俑者。早在1895年1月,伊泽修二就开始鼓吹殖民地同化教育的重要性——“派兵以镇压叛乱,从外部使民

心臣服,在维持新领土秩序之际,确有其必要。然不可只使其威服,而不谋怀柔之计。故从外部以武力征服之同时,还须征服其思想,使其抛却旧国之梦,发扬新国民精神。改造其思想,使其同化为日本人,成为完全一致之国民。如此思想之征服,即为普通教育之任务。”^[1](笔者译)随着日本侵华范围的扩大,日语教育逐渐在多地推广,近卫内阁在1938年推出“东亚新秩序”后,作为“总力战”的一环,日语教育在各地全面展开。国语学家西尾实也为其呐喊:“大东亚战争即为思想战。思想战之尖兵为语言,其后盾亦为语言。欲推动大东亚战争,须在个大东亚普及日语。”^[2](笔者译)

日本在华使用的日语教科书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变迁。其中在台湾地区推行日语教育之初,因没有合适的教材,殖民当局直接使用了日本文部省发行的“内地”(笔者注:当时日本将殖民地称为“外地”,将日本国内称为“内地”)《小学读本》。随后,在伊泽修二的主持下,《新日本语言集(甲号)》(1896)、《台湾适用会话入门》(1896)、《台湾适用国语读本初步》(1896)等立足于台湾地区的教科书很快被编订出来,随后《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1901-1903)、《公学校用国民读本》(1913-1914)等也陆续投入使用。随着日本逐步蚕食整个东北地区,乃至卢沟桥事变后,占据我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日语教育在多地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涌现出了多种多样的日语教科书。据田中宽整理,在1940年5月时,中国各地使用的日语教科书各不相同(见表1)^[3]。

表1 各地所用日语教科书

编订部门	教材名
伪临时政府教育部编审会	《小学日语读本》
	《初等日语读本》
	《正则日语读本》
伪维新政府教育部	《日语教科书》
伪台湾总督府文教局学务科	《日语读本》
	《日语捷径》
伪晋北自治政府	《初等小学校用日语教科书》
	《高级小学校用日语教科书》
伪察南自治政府	《初等小学校用日语教科书》
	《高级小学校用日语教科书》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日语教科书》
	《公民学校用日语教科书》

在各地殖民、傀儡机构纷纷编订本地日语教材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各地区教科书编订质量参差不齐,标记方式、语法说明不一致等。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重视教材的统一编撰工作。1939年12月,文部省设立“日语教科用图书调查会”,翌年11月,文部省图书局国语科成立,12月,日语教育振兴会成立,开始统一编订日语教科书。

《口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面世的,其也是日语教育振兴会最为著名的教材之一。该套教材由兴亚院委托文部省日语教科书调查会编订,东亚同文会发行,日语教育振兴会成立后,改为其发行。整套教材包括上、中、下三册,具体内容由文部省图书监修官各务虎雄执笔完成。该套教科书于1941年首次发行,182mm×127mm开本,彩色印刷。据五味政信考察,该教材在短短数年内发行量达17万册^[4]。

为了使该教材能够全面覆盖整个殖民地的所有人群,日语教育振兴会还制作了上中下三册的盲文版,由板仓正一译注,1942年发行。此外,为了进行有效的教学指导,该教材还配有三册详细的教学指导用书,供授课教师使用。教学指导用书由西尾实和长沼直兄撰写,还附有课文的中文译文。

该书是“日本语教育振兴会”成立后发行的代表性教材之一,最初使用范围被设定为中国大陆。因此,不管是内容还是背景,该教材都体现出了浓郁的中国风情。后来,又被用于菲律宾、泰国等,且获得了使用教师的好评。^[5]

本文将从编排形式与形象构建这两方面来进行考察,为使其一目了然,先将该教材的基本信息整理如下页表2所示。

2 《口语》的编排形式

在教材的编排形式方面,我们发现《口语》主要有如下显著特征。

2.1 大量使用彩色插画

教材使用了大量的彩色插画,画面中既有上课、早操、交谈等学校场景,也有寒暄、购物、家庭

表2 《口语》的基本特征

	内容页数	使用对象	印色	配图数	内容构成	文字标记
《口语》上	48	中国地区青少年	彩色	45(发音图除外)	基本对话与课文	表音式假名
《口语》中	50	中国地区青少年	同上	50	同上	同上
《口语》下	44	中国地区青少年	同上	44	同上	同上
《学习指导书》上	292,另附19页	日语教师	黑白	无	授课讲解	汉字、表音式假名与历史假名混用
《学习指导书》中	302,另附14页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学习指导书》下	209,另附15页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口语》(盲文版),三册	略少	中国地区盲人	同上	同上	基本课文	盲文

团聚、道别等生活场景,村庄、月色、繁星、晚霞、彩虹、牛羊等自然风物,风筝、秋千、滑梯、跷跷板等游戏玩具,还有富士山、樱花、旭日旗、东京等日本元素,以及奔驰的火车、耸立的工厂、巍峨的铁桥、整洁的电车站等现代文明的产物。在总计142页的课文(三册)中,插画数量达到139幅(不计发音图)。整套教材采用了彩印这一成本不菲的印刷形式,画面精美,色调明快。这些插画一方面有利于教师的讲解与学生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诱导中国青少年对日本的向往。显然,对于涉世未深,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充满向往的孩子们来说,教材中这些精美的画面无疑是颇具魅力的。日本当局应该对这部教材颇为满意,因此,1942年在菲律宾推行日语教育时,军政部直接采用了该套教材,只是让随军画师连夜将原书中中国少年的服装与中国风土等内容修改成了菲律宾风格。除此之外,“长昭直兄文库”还收录了日语教育振兴会1942年发行的一套面向儿童的绘本(共六册),该组绘本由一批青年画家精心绘制,其画面之美也令人印象深刻。同样,日语教育振兴会1943年发行的《初等学校用日语教本》中的插画也颇为精致。

但另一方面,很有意思的是,同时期日本面向在中国的日本人子弟进行汉语教育时所提供的教科书却有粗制滥造之嫌,汉语学者那须清回忆儿时“在旅顺学习汉语时所用的教材时曾提到,“四六判(笔者注:日本印刷用纸规格,相当于32开)小本,不时出现的插画也与小学(汉语)教材中的图并无二样,都是些非常业余的铅笔画。这是大连印刷的,装订也很粗劣”^[6](笔者译)。通过这种教

材的质量对比,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日语教材的“用心之深”。

2.2 采用表音式假名

在书写方式上,《口语》没有沿用当时日本国内教科书普遍使用的历史假名,而是通篇使用了表音式假名,这在当时还是颇为少见的。所谓表音式假名是区别于日本长期使用历史假名,与日语发音直接对应的假名形式,日语现行的现代假名即由其变化而来。采用表音式假名,可能与该教材的定位有关——既然是为了青少年初学者学习日语(尤其是口语)而编写的教材,直接与发音对应的表音式假名自然是最为合适的选择。但《口语》的教师用书中却还主要是历史假名,因此,形成了该教材指导用书中汉字、历史假名以及表音式假名混用的局面。不仅如此,概观同时代的日语教材,上文提到的日语教育振兴会1942年发行的系列绘本采用的是历史假名,1945年发行的《南方诸地域用中等学校日语教本》(第一卷)使用的也是历史假名,当时伪维新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发行的《日语教科书》(第一卷)也是通篇历史假名。相比较而言,《口语》选择了与日语发音最为接近的表音式假名,表明了该套教材在编撰方面的领先性。另一方面,从众多教材假名使用方式的不一致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在对外推行语言同化政策之时,日语自身的统一规范尚未完成。

2.3 教学指导用书具体详细

《口语》虽然每课课文都非常简短,但教学指导用书配备了极为丰富细致的讲解。指导用书内

容平均为教科书内容的5至6倍左右。每课的课文虽一般只有一幅图和寥寥几句话,但相应指导用书中的内容却往往有5、6页之多。教学指导用书每课一般包括“教材”、“指导”和“备考”三部分,其中“教材”列出了该课的课文、音调、句型、词汇和教具等,“指导”包括指导要领和问答练习(分为练习、提示与总结),“备考”是关于注意事项的说明。教学指导用书详细规定了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工具、教学步骤和指导方法等,对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语言、动作、举例等都有详细的说明,可以说,哪怕是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人,只要具有一定的日语读说能力,都可以依照指导用书进行教学。要使日语在占领区成为“普及语言”,势必需要大量的日语教师,而临时招募的教师的水平自然会参差不齐。为使缺乏经验的教师能迅速上手,细致具体的指导用书成为必要选择。同时,具体而细致的指导用书,也可以控制教师的授课内容,使其不至于偏离日语同化政策的发展方向。

2.4 对应“直接教学法”

不同于早期的教材,该套书全部用日语编写,在三册教科书中没有一句中文提示或讲解,尽管指导用书的附录里有编撰要旨与课文的中文译文,但显然这不是为学习者准备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该套教材对应的是“直接教学法”(或称为“浸入式教学法”,是指教学过程中完全不使用学习者母语,全部使用目标语言的教学方法)。

在近代日本对外语言同化教育过程中,教学法经历了由“对译法”向“直接法”的转变。作为日本对外语言同化教育的始作俑者,伊泽修二在中国台湾推行日语教育时,最初使用的是对译法,也就是将当时的小学教材翻译成台湾当地语言,用以辅助教学。伊泽修二最初主持制定的教材,如《新日本语言集(甲号)》(1896)、《台湾适用会话入门》(1896)、《台湾适用国语读本初步》(1896)等,也都附有汉语对译文,教师可以借此进行授课。这一教学方式也是当时形势所迫。彼时日本侵占台湾地区不久,派遣过去的日语教师既缺乏教育实践经验,也不会当地语言,如果不借助教材上的

当地语言译文,势必将难以讲解。这样的教材不仅可用于针对中国人的日语教育,还可以供日本人学习台湾当地语言。无独有偶,19世纪末开始,曾有大量中国留学生赴日本留学,松本龟次郎是近代日本对华留学生日语教育的开创者,他所主持编写的一系列教科书也都有很浓厚的对译法色彩,如《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1904)、《汉译日本语会话教科书》(1914)、《汉译日本口语语法教科书》(1919)、《译解日本肯綮大全》(1934)等。这种鲜明的对译法色彩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对留学生日语教材中,如在松宫弥平主持下由日语文化学校发行的《日本语会话》(1937)、《A GRAMMAR OF SPOKEN JAPANESE》(1935)等。

1897年,山口喜一郎赴台湾地区后,开始尝试逐渐摆脱对译法,尽量用日语教授日语。适合直接法的教材也被制定、运用。山口喜一郎在1910年从中国台湾转赴朝鲜,并将直接法带到了朝鲜。1925年,山口喜一郎离开朝鲜,到大连地区赴任,之后一直在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教授日语。但是,兴亚协会面向印度尼西亚编撰的《初等日本语会话读本》(1942)却采用了当地语言的讲解方式。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东北等地区的日语教学比南洋等地要更成熟些。

那么,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这么执着地坚持“直接教学法”呢?对此,彼时长期在东北地区教授日语的前田熙胤解释道,“满洲”初等教育中实行日语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其体会我国民族精神,由此陶冶儿童品性。欲实现这一目标,须使儿童直接沉浸于我们国语中来进行体会。故此,选择直接法作为教学方法,无疑是当然也是自然的。”^[7]

3 《口语》的形象构建

除了具有以上这些显著的编写特征之外,在具体的形象构建方面,该套教材也颇费心思。通过页面设计、内容安排以及教师指导等,《口语》完成了对日本、战争及中国的形象构建。

3.1 对日本的美化

首先是对日本形象的美化宣扬。从上册扉页

的富士山图开始,《口语》就开始了连续不断的美图秀。在这些图片的包装下,我们只看到美丽宁静的家园,朝气蓬勃的校园,繁华发达的国家,一派祥和的国土。教师用书也要求,当教科书中提到日本的先进事物,如火车、电车、繁华商店等时,教师要向学生传递在日本生活的喜悦以及日本的先进文化;在讲到富士山、樱花等日本特有的景色时,教师要用挂图的形式展现日本的自然美。编订者希望能在教科书中营造出一个美好富强的日本,民族和谐相处的“满洲”。根据教科书中的会话内容,其设定的场景应该是在东北地区,插画中不时出现的长褂和旗袍也显示出,编订者想让我们认为这就是在中国。但画面中的民宅、国旗、樱花、校园、学生制服、铁路等,都透露出浓浓的日本风情。教材中人物的名字、举止,也都有明显的日本特色。考虑到这部教材是在日本编订的,这也无可厚非。最为滑稽的是,在下册第六页,居然出现了从东京开往北京的火车票,让人觉得似乎北京就在日本国内。教科书的编订者身在东京,通过臆想编撰了这部使用于中国大陆的教材,也臆想了一个被彻底征服与同化的“满洲”。

3.2 对战争的淡化

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口语》基本上围绕家庭、学校、村庄、城市与自然场景展开,或是宁静温馨,或是其乐融融,或是静美动人,或是轻松祥和,让人完全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息。通过这些场景淡化战争,既可美化“满洲”意象,亦可粉饰太平。但是,通过对教师用书的研读,我们发现,不管如何淡化,当时的时代背景还是会不自觉地透露出来,例如,在讲授《口语》(下)第一课“东方的天空变亮了”(「ヒガシノソラがアカルクナリマシタ」)时,教师用书中的指导要领要求,教师须让学生掌握冉冉升起的太阳是兴亚精神的象征。

3.3 对中国的矮化与同化

在内容的安排上,我们还发现,尽管该套教材完全是在日本编写的,考虑到使用对象,其中还是

穿插了些中国元素,比如插画中的中国人,比如会话中出现的中国地名“奉天”、“北京”、“上海”等。这些元素随着学习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增多,其在教材中的定位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在书中出现的中国形象,或者是场景,或者是故事发生所需要的空间背景,或是看客,或者是学习者(而且是尚未习得“文明语言”的无知者),直到最后才变成了参与者。作为整套教材的总结,最后那个新年场景非常意味深长:在日本新年这一天,家家户户门口挂着日本的旭日旗,身穿长袍的中国男子在与日本男子鞠躬,以日本方式庆祝“新年”。这一场景,既突出了两者的身份差异(穿着),又强调了两者的文化相同(行礼)。两个不同民族的个体融洽地同化在了日式氛围内,这恐怕是教材编订者所期许的温馨画面吧。教科书通过这种有意无意的隐喻性形象构建,实现了对中国形象的矮化,也完成了对同化的想象。无独有偶,谭建川(2015)在考察日本近代中小学课本中关于中国台湾的内容时,也发现日本对台湾原住民进行了贬低,将其定位为野蛮民族。

4 近代语境中 理想的日语教科书与现实的桎梏

在教材的评价标准中,“针对性”常被认为是首要的原则。关于针对性的内涵,李泉认为,“教材的设计和内容的编排,要适合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适合学习的环境和条件;要体现目的语的重点和难点,体现学科性质和课型特点”^[8]。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作为一部在近代语境中日本面向中国青少年的日语教材,《口语》是“合格”的——其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彩色插画的大量使用,既增加了趣味性,激起了学生对日本的向往,促进了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也有利于教与学;表音式假名的导入,适合初学者掌握;直接式教学法,有益于强化对中国学生的同化;详细具体的教师指导用书,便于经验不足的教师迅速上手,又可规范与控制教师的教学行为;围绕日本与中国形象的构建,更是直接服务于该教材编撰的根本目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口语》这么一部日语入门教材,我们可以想象出近代日本在对外推行语言同化教育时所追求的“理想”的教科书形象。其实,《口语》教材的操刀者各务虎雄对此曾有过露骨的论述。

虽说编撰教科书之要义在于传递日本文化与精神,充分彰显日本特色,但并非在教科书中大肆颂扬日本即可。从政策角度看,必须警惕在教科书中露骨地宣扬日本特色的方式。不是说“快吃!”对方就会欣然进食。我们必须做到,即使说“不许吃”对方也忍不住不吃,这才是最佳方式。即便无法如此,教材也应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日本文化与日本精神,在对方无意识之间实现编撰者的意图。如此看来,虽然有时候也需要明确宣扬日本国的好处,但我们在教科书中仍应尽量不着痕迹地具体展示出日本的优越性。如此一来,表面上好像看不出编撰者的意图,然而当读者真正使用该教材进行学习后,目的就会充分实现。这才是理想的教材。^[9]

(笔者译)

结合上述内容,我们可以认为,作为一部具有代表意义的对华日语教科书,《口语》基本上是“合格”的。但同时,正如我们注意到的,同时期各教材在假名书写方式等方面还不尽相同,尤其是《口语》教材与指导用书所用的假名就不一致。这也说明了近代日本语言同化政策的一个先天不足:日语还没有实现本体内部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就迫不及待地大肆对外强行推广。日本学者关正昭在回顾日本近代日语教育史时也承认,“对中国大陆的日语普及政策,是在日语的标准发音、标记方式、教科书的编撰方针都无定论的情况下,文部省

以及兴亚院匆匆采取的措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侵略范围扩大到亚洲多个地区,作为培植日本精神手段的日语普及工作开始被强制推行,成为军政的一环。”(关正昭,1997:39)(笔者译)由此可见,《口语》既体现了近代日本在华语言政策的同化本质,又暴露了其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

但同时,正如神谷道夫指出的,我们也不可否认,近代日本对外语言同化教育对二战后的日语改革与日语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教学法(直接教学法等)、教科书内容安排(语法、句型的学习顺序等)等方面。近代日本对外的语言同化教育,客观上为战后日语的规范改革以及国际传播积累了经验和教训。^[10]

5 结 语

毋庸赘言,本文所探讨的教材《口语》不能代表近代日本在华所用的所有日语教科书,它只是当时众多日语教材中的一种。即使是在东北地区,当时日语教材也有各种类型,除了本文所探讨的直接教学法教材之外,较为著名的还有大出正笃所主张的“速成教学法”式教材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作为文部省统编教材,《口语》可以说是近代日本语言同化政策推行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历史见证者。对其的深入研究,可以探知近代日本对华侵略过程中的一个语言同化脉络。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日本在华语言同化政策研究”(项目批号:16BY055)。项目主持人:陈林俊;2017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日本在华日语教科书研究”(项目批号:2017SJB17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陈林俊]

注

[1] 安達信裕. 統治初期の台湾での同化教育について—国語教育を中心に—[J]. 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 2003(4): 81.

[2] 関正昭. 日本語教育史研究序説[M]. 東京: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 1997: 73.

[3] 田中寛. 戦時期における日本語・日本語教育論の諸相[M]. 東京: ひつじ書房, 2015: 48.

[4] 五味政信. 戦前の日本語教育と「日本語教育振興会」[C]. 日本語学校論集, 1987(14): 164.

- [5] 河路由佳. 日本語教育と戦争——「国際文化事業」の理想と変容[M]. 東京: 新曜社, 2011: 243.
- [6] 那須清. 旧外地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M]. 東京: 不二出版, 1992: 100.
- [7] 前田熙胤. 満州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私見[J]. 日本語, 1941(5): 30.
- [8] 李泉. 论对外汉语教材的针对性[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2): 51.
- [9] 各務虎雄. 日本語教科書論[M]. 東京: 育英書院, 1943: 53-54.
- [10] 神谷道夫. 太平洋戦争期フィリピン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C]. 小出記念日本語教育研究会論文集, 2000(8): 7.

参考文献

- 马可英. 1937年前中国人编日语教材考略[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3).
- 李小兰. 试论清末东文学堂日语教科书[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2).
- 李小兰. 清季中国人编日语教科书之探析[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
- 陈林俊. 近代日本在华语言同化政策研究述评[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2).
- 陈林俊. 近代日本语言同化观研究——以保科孝一为例[J]. 日本问题研究, 2017(6).
- 徐雄彬, 王升远.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的奴化教育——以日语教育为中心[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5(4).
- 鲜明. 清末中国人使用的日语教材: 一项语言学史考察[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谭建川. 日本近代教科书的“台湾故事”: 殖民论述与殖民记忆[J]. 东疆学刊, 2015(3).
- イ・ヨンスク. 「国語」という思想: 近代日本の言語認識[M]. 東京: 岩波書店, 2012.
- 川村湊. 海を渡った日本語—植民地の「国語」の時間[M]. 東京: 青土社, 2004.
- 石剛. 日本の植民地言語政策研究[M]. 東京: 明石書店, 2005.
- 吉岡英幸. 第二次大戦期までの日本語教育関係文献目録[R]. 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による基盤研究「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教材・教授法の史的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 2004.
- 多仁安代. 大東亜共栄圏と日本語[M]. 東京: 勁草書房, 2000.
- 関正昭, 平高史也. 日本語教育史[M]. 東京: アルク, 1997.

作者简介: 陈林俊(1980—) 男 汉族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日语语言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taffychen@163.com

作者简介: 许长明(1983—) 女 汉族 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日语教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sjcxmdjtc@163.com

A Study of Japanese Textbooks Used in Modern China: Taking the Textbook "Spoken Language" Compiled by MEXT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language assimilation policy in modern China, Japan has compiled and used a large number of Japanese textbook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extbook "Spoken Language" as an example, compares it with other relevant textbooks of the same period, and analyzes the main features of content arrangement and image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content arrangement, the textbook uses a large number of color illustrations, written in phonological kana, and corresponds to direct teaching methods. The teacher's book is detailed and thorough. In terms of image construction, the textbook strives to achieve the beautification of Japan, the desalination of the war, as well as the shrinking and assimilation of China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scenes, characters, and cont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as a Japanese textbook used in China, the textbook shows a clear design.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consistencies in the writing methods of kana and other materials also reflect the inher-

ent deficiencies of modern Japanese language assimilation policy. Undeniably, the compil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textbooks has provided Japan with som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promoting Japanese after the war.

Keywords: Japanese textbooks; image construction; assimilation

Authors' Information

Chen Linjun (male) Year of Birth: 1980

Post-doctoral Student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hangzhou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nguistics

E-mail: taffychen@163.com

Xu Changming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3

Lecturer at Changzhou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ail: sjcxmdjtc@163.com

学术用语对照

文学领域(古代部分)

日文	中文	英文
修験者・験者・山伏	深山修行者	a <i>Shugenja</i> (an ascetic of shugendo)
受容	接受	acceptance
女流文学	女性文学	(Woman) Literature
清国	清朝, 清代	The Qing Dynasty
説話	短篇故事	story, tale
転生譚	转生轮回故事	metempsychosis
夢合	解梦	the reading (Interpretation) of a dream
余情	余韵	an aftertaste, suggestiveness
話型	母题	motif

(待 续)

参考文献:

- 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日汉大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中国文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古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汉英大词典[M].第三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现代汉语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日本古典籍書誌学辞典[M].東京:岩波書店,1999.
 岩波日中辞典[M].東京:岩波書店,1985.
 例解新日中辞典[M].東京:三省堂,1995.
 研究社新和英大辞典[M].第五版.東京:研究社,2003.
 アドバンスト フェイバリット和英辞典[M].東京:東京書籍,2004.
 KENKYUSHA'S NEW COLLEGE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M].東京:研究社,1996.

(资料整理: 河北大学 霍君 墨尔本大学 刘泽筌)